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阶段研判及演化特征

钱娟^{1,2}, 李金叶¹

(1.新疆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乌鲁木齐 830046;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院, 乌鲁木齐 830002)

摘要:文章运用 Bai-Perron 多重结构突变模型找出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的结构突变点, 并通过 chow 突变检验模型和现实有效性检验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阶段进行研判, 运用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探寻突变点前后不同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是否存在转换, 及增长动力转换特征与规律。结果表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存在 3 个内生结构突变点, 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存在时间异质性, 且呈阶段性转换特征; 经济增长动力正从“要素禀赋型增长动力”向“科技进步型增长动力”、“结构优化型增长动力”和“制度创新型增长动力”转换。

关键词:增长动力转换; 阶段研判; 动力演化特征; 多重结构突变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487(2017)23-0118-05

0 引言

“动力”一词泛指事物运动和发展的推动力量, 在现代管理中将动力分为物质动力、精神动力和信息动力。经济增长动力即指推动经济发展或增长的力量, 正确运用动力机制, 能持续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或增长。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 GDP 以接近 10% 的年均增速快速增长, 但从 2011 年以后, 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 传统经济增长动力出现衰减, 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的新要求。那么究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是否存在阶段性转换? 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力又是如何呢?

从国内外研究来看, 关于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一国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禀赋、技术进步、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产权制度等因素, 可归结为要素禀赋、科技进步、结构优化和制度变迁动力。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劳动及资源能源的消费^[1,2],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源于研发和技术创新引致的生产率进步^[3-5], 还有的学者认为经济结构转变、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6-9]。同时在经济增长阶段论中, 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具有阶段性特征, 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特点是不同的^[10-13],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正处于从投资、出口拉动向城镇化、服务业拉动, 从工业化增长向城镇化增长的“双过渡”时期^[14,15]。纵观国内外相关文献, 发现普遍在对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研究中没有考虑到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结构突变问题, 由于新中国自成立以来, 我国历经数次剧烈的经济与社会变革, 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多重结构突变的可能性较大^[16], 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阶段性特征时有必要考虑结构突变问题。因此, 本文充分考

虑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结构突变因素, 运用 Bai-Perron 多重结构突变模型科学划分中国经济增长阶段, 并构建拓展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 采用 Prais-Winsten AR(1) 方法, 分析结构突变点前后不同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特征与规律, 最后建立 VAR 模型检验扩展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的稳健性。

1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1.1 模型构建

1.1.1 Bai-Perron 多重结构突变模型

由于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变化特征, 为验证增长动力存在时间上的异质性, 本文引入 Bai 和 Perron(2003) 突变模型找出中国经济增长历程中未知的内生结构突变点, 并运用 chow 突变检验对找出的结构断点进行验证, 同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史对经济增长阶段进行科学划分。基于经济增长 $\ln GDP$ 进行 BP 结构突变检验, 结构突变点最小样本 $M=5$ 、 $Z=0.05T$, 则存在 m 个未知结构断点的时间序列模型为:

$$y_t = a_j + W_j t + \tilde{y}_t \quad t=1, 2, \dots, T; j=1, 2, \dots, m+1 \quad (1)$$

$$\tilde{y}_t = \tilde{T}_{y_{t-1}} + \sum_{i=1}^n a_i \Delta \tilde{y}_{t-i} + e_t \quad t=1, 2, \dots, T \quad (2)$$

其中, \tilde{y}_t 为退势之后的时间序列值, 其滞后阶数 n 可通过“ $F-sig$ ”检验获得, e_t 为残差项。

1.1.2 扩展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

基于 Lucas(1988)^[16] 的内生增长模型, 选取一个包括人力资本贡献的生产函数:

$$Y = AK^\alpha (u h L)^{1-\alpha} h_c^\gamma \quad (\gamma > 0) \quad (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1661112); 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丝路科研奖学金”项目(JGSL15007)

作者简介:钱娟(1987—), 女, 江苏泰州人, 博士, 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通讯作者)李金叶(1963—), 女, 新疆乌鲁木齐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假设 $\beta = 1 - \alpha$, 即资本 K 和人力资本 uhL 收益不变, A 代表给定外生技术水平。Y 代表总产出, K 为固定资本存量, uhL 代表人力资本存量, h^{γ} 代表人力资本所带来的外部效应。为捕获技术进步、结构因素和制度因素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将这些变量内生引入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 构建扩展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 取对数形式为:

$$\ln Y_{(t)} = \ln A + \alpha \ln K_{(t)} + \beta \ln(uhL)_{(t)} + \varepsilon \ln h_{\varepsilon(t)} + \varepsilon_1 \ln L_{(t)} + \varepsilon_2 \ln gov_{(t)} + \varepsilon_3 nsta_{(t)} + \varepsilon_4 inf_{(t)} + \varepsilon_5 wcs_{(t)} + \varepsilon_6 \ln ops_{(t)} + \varepsilon_7 ins_{(t)} + \varepsilon_8 urs_{(t)} + \varepsilon_9 fins_{(t)} + \varepsilon_{10} \ln tcs_{(t)} + c_{(t)} \quad (4)$$

1.2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1) 要素禀赋变量: 固定资本存量(K), 通过永续盘存法对 1952—2015 年资本存量按照 $K_t = K_{t-1}(1 - \delta_t) + I_t$ 方法进行计算; 人力资本存量(uhL)为劳动力总量与其所受教育年限的乘积, 劳动力总量为历年就业人数(L), 基础设施投入以平均标准道路里程(inf)衡量。

(2) 科技创新变量: 科技资本存量(tcs)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

(3) 制度变迁变量: 非国有化程度(nsta)为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工业产值所占比重, 政府主导程度(gov)以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

(4) 结构变动变量: 产业结构(ins)为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值, 城镇化率(urs)为城镇人口比重, 外贸依存度(ops)为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 外资存量(wcs)为永续盘存法计算“利用外资”数据, 金融结构(fins)为贷款量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本文选取的时间窗口为 1952—2015 年, 数据来自《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2 实证分析

2.1 经济增长动力的时间异质性检验

首先对我国 1952—2015 年 lnGDP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从图 1 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 lnGDP 时间序列满足平稳性。然后根据 Bai-Perron 内生多重结构突变模型 (1), 运用 GAUSS 软件对 lnGDP 时间序列经 5000 次迭代, 从表 1 和表 2 检验结果可知, 在 5% 显著性水平下 lnGDP 时间序列无法拒绝存在结构突变点的假设, 存在 1977 年、1994 年和 2011 年 3 个结构突变点。可见, 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时间上的异质性, 呈阶段性增长特征, 第一个突变点与 Aoki(2011)^[14]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划分一致。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在不同阶段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为验证 BP 检验在未知内生结构突变点情况下找出的结构断点是否正确, 运用 chow 突变检验对 1977 年、1994 年和 2011 年结构断点前后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明显变动进行验证, 结果表明在 1977 年、1994 年和 2011 年 3 个突变点上均拒绝原假设, 即在这 3 个时间点前后均存在突变现象, 存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性动力。因此, 根据结构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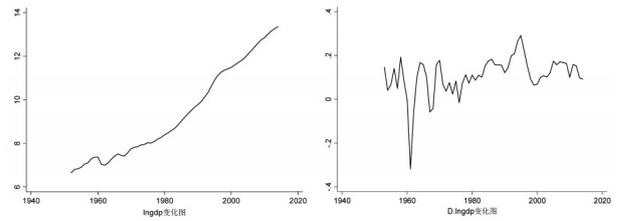


图 1 lngdp 和 D.lngdp 的单位根检验

表 1 lnGDP 时间序列 Bai-Perron 内生多重结构突变检验结果

$SupF_{\tau}(1)$	$SupF_{\tau}(2)$	$SupF_{\tau}(3)$	$SupF_{\tau}(4)$	UD_{max}	WD_{max}
11.56*	536.20*	676.32*	-701.31*	676.4*	795*
$SupF_{\tau}(2/1)$		$SupF_{\tau}(3/2)$		$SupF_{\tau}(4/3)$	
23*		16**		11*	

注: *、** 分别表示 1%、5% 的显著性水平。

表 2 Bai-Perron 检验测定的结构断点

lnGDP 断点时间	T_1 /年	T_2 /年	T_3 /年
结构断点	1977	1994	2011
置信区间(95%)	1976—1981	1993—1998	2008—2013

变点可将中国经济划分为 1952—1977 年、1978—1994 年、1995—2011 年和 2011—2015 年四个增长阶段。

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史可知,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 3 个结构突变点(1977 年、1994 年和 2011 年)都伴随着一些特殊的历史事件, 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1977 年前后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期, 1978 年实施改革开放战略, 确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重大改革, 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1994 年实施分税制改革, 确立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的基本财税制度, 从供给侧改革来看税收制度是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动力重构的关键所在^[17]。

2.2 结构突变点的有效性验证

结构突变点的判断主要依据该点前后是否存在明显的变动, 由于我国一直致力于市场经济的渐进式改革中, 经济社会历经数次重大变革, 且经济增长存在滞后性, 单从单一年份经济增速来看波动起伏较大, 不利于判断结构突变点的存在, 因此, 在考察结构突变点的现实有效性时, 本文将其置于一定的时间段来综合考虑, 按照中国每五年出台计划或规划的时间间隔分别计算出从“一五”到“十二五”期间的年均增速, 从图 2 可知“一五”到“三五”期间经济增长波动较大, 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度计划经济体制阶段, 处于经济恢复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时期; “三五”到“五五”时期经济增长相对稳定但增速较低, 国家领导人充分意识到计划经济不适用当时的经济发展需要, 积极探索经济体制改革,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引入市场经济体制; “五五”到“十一五”时期经济增长保持有规律波动下的快速增长, “八五”时期达到历史最高, 年均增长 12.3%, “九五”到“十一五”期间保持了 15 年的持续增长, 此阶段为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式转轨改革时期的改革红利、要素投入增长红利等因素叠加效果; 但“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降, 年均增长 7.8% 低于改革开放以来任何一个五年年均增速, 出现明显的经济增速放缓和内外增长动力

不足趋势,经济社会矛盾也进一步突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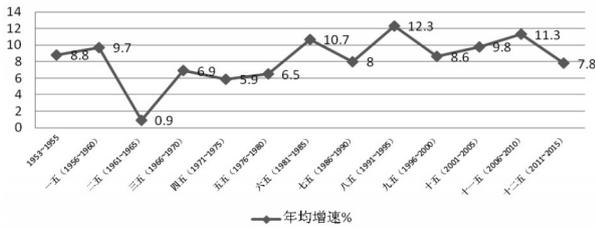


图2 中国“一五”至“十二五”时期GDP年均增速

从结构突变点来看,1977年处于“五五”时期,该阶段前后总体呈现“先降后升”趋势,从“一五”时期的年均增速9.7%波动性下降到“五五”时期的6.5%,之后每五年年均增速均高于该时期,个别年份波动较大,因此,将1977年置于前后一定的时间段来综合考虑,可看作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构突变点(或拐点);1994年处于“八五”时期,该阶段前后总体呈现“先升后降”趋势,年均增速12.3%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年均增速最高的五年期,因此,将1994年置于前后一定的时间段来综合考虑,可看作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构突变点(或拐点);2011年处于“十二五”时期,该时期年均增速为7.8%,从年均增速绝对值来看,是改革开放以来年均增速最低的五年期;从年均增速降幅来看,是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三次年均增速下降幅度相对较大的五年期,其中“七五”时期下降了2.7个百分点,“九五”时期下降了3.7个百分点,“十二五”时期下降了3.5个百分点,以及“十二五”时期以来诸多学者专家做出中国潜在经济增速趋于下降,传统经济增长动力出现衰减,“刘易斯拐点”、“中等收入陷阱”等一些发展问题的预期,中国经济增速将明显放缓,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时期。因此,将2011年置于改革开放以来30年发展及对“十三五”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时间段来综合考虑,可看作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构突变点(或拐点)。

2.3 经济增长动力阶段性演变特征分析

为充分校正时间序列自相关带来的偏差问题,采用Prais-Winsten AR(1)回归方法,由于2011—2015年时间序列样本较少回归模型不稳定,故运用Stata11.2软件基于扩展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分别在1952—1977年、1978—1994年和1995—2015年三个时间段进行回归,探寻在突变点前后中国经济增长各个阶段增长动力是否存在转换,及动力转换特征。

从表3回归结果来看,1952—1977年阶段中国资本、劳动力、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均表现为1%显著水平)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基础设施、非国有化程度(市场化程度)、利用外资水平、城镇化水平表现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政府干预程度、金融结构不合理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综合来看,该阶段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资本、劳动力。

从1978—1994年回归结果来看,资本、劳动力、基础设施、利用外资、科技创新、城镇化水平表现为对经济增长驱动正效应,但资本、劳动、利用外资、产业结构调整驱动经济增长的显著性有所下降,基础设施、外贸依存度对经

表3 分阶段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lngdp			
	1952—1977	1978—1994	1995—2015	
要素禀赋	DlnK ₀	3.113* (7.561)	1.789*** (1.356)	0.8450 (0.679)
	Dln(uhL) ₀	0.639 (1.272)	-0.742*** (-0.176)	-0.237* (-0.276)
	lnL ₀	1.050* (4.12)	0.742*** (2.03)	3.421*** (1.521)
	lnh ₀	0.099*** (3.423)	0.211 (1.923)	0.363*** (2.573)
	inf ₀	0.059 (1.713)	0.849** (2.734)	0.150 (0.831)
科技创新	Intcs ₀	0.328* (2.611)	0.216 (0.112)	0.398* (0.212)
	lnops ₀	0.054*** (1.739)	0.018 (0.134)	-0.279* (-2.311)
	wcs ₀	—	6.499*** (0.872)	9.459* (1.845)
结构变动	ins ₀	1.048 (0.712)	0.920*** (1.372)	-0.767* (-1.977)
	urs ₀	0.064 (0.036)	1.155 (0.789)	4.704 (2.593)
	fins ₀	-0.553* (-2.834)	-0.244 (-0.459)	-0.093 (-0.520)
制度变迁	lngov ₀	0.353 (0.577)	0.798*** (2.354)	0.645*** (1.431)
	nsta ₀	0.489** (2.565)	0.626 (0.732)	-0.553 (-0.645)
C	-3.341* (-3.65)	-7.621 (-1.106)	5.321 (0.346)	
原始DW值	2.352	2.445	1.679	
改进DW值	2.061	2.143	—	
观察值	25	18	21	
调整后R ²	0.9993	0.9996	0.9989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相应t值。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显著增强。非国有化程度、金融结构不合理性因素制约经济增长的问题进一步凸显。综合来看,该阶段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资本、劳动力、利用外资水平和城镇化水平。

从1995—2015年回归结果来看,资本、劳动力、基础设施、利用外资水平、科技创新、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其中资本、劳动力、非国有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进步减弱,科技创新和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显著增强。对外依存度、产业结构扭曲、政府干预均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负效应。综合来看,该阶段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资本、劳动力、利用外资水平、科技创新和城镇化水平。

表4 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动力演化特征

时间段	1952—1977	1978—1994	1995—2015
主动动力	资本、劳动力	资本、劳动力、 利用外资、 城镇化水平	资本、劳动力、 利用外资、 城镇化水平
负动力	政府干预过度、 金融结构不合理	金融结构不合理	外向型结构不合理、 产业结构扭曲、 政府干预过度、 市场化程度低

因此,从表4各个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演化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本、劳动力的2个动力因素逐步扩展到依靠资本、劳动力、利用外资水平和城镇化水平4个动力因素,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有所增加,可见

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是不完全相同的,存在动力转换现象。要素禀赋型增长动力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驱动力,但其中资本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不断衰减,劳动力要素驱动力更突出的表现为人力资源规模和结构与经济发展所需不匹配矛盾,说明劳动力资源没有有效转化为人才动力,人才结构不适应经济发展,“人口红利”尚未有效转化为“人才红利”。城镇化水平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即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动动力。科技创新一直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驱动作用尚未凸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质动力。整体来看,产业结构扭曲、金融结构不合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负动力,且阻碍经济增长的负动力不断增多,这与当前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现状相吻合。同时经济增长动力正从“要素禀赋型增长动力”向“科技进步型增长动力”、“结构优化型增长动力”和“制度创新型增长动力”转换。

3 扩展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考虑扩展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可能存在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采用VAR模型对回归方程进行稳健性检验,但基于VAR模型中不宜含有太多变量,因而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结构变动因素和制度变迁因素分别合成结构指数和制度指数,再对实际GDP、制度指数和结构指数进行VAR稳健性检验。

通过表5检验结果与表4回归结果对比,发现制度指数系数符号与政府主导指标系数符号相反,但回归中政府主导因素并不显著可忽略,其他指标符号一致;结构指数除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指标系数符号不一致外,其他均一致,表明扩展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情况下仍是稳健的,说明本文构建的实证方法是科学的。

表5 扩展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d.lngdp	
解释变量	VAR模型
L.lngdp	1.139* (10.14)
L.dlnstru	0.127* (4.29)
L.lninst	0.038* (5.59)
c	0.810* (6.27)
观察值	62

注:*表示1%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相应z值。lnstru、lninst分别表示结构指数和制度指数取对数形式。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对195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变化的研究,本文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因素既取决于资本、劳动、基础设施等要素禀赋水平,也与经济结构变化、制度变迁

密切联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要素禀赋驱动作用逐渐减弱,而经济结构和制度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牵动作用越来越大,实证结果表明:

(1)中国经济增长存在3个结构突变点,分别为1977年、1994年和2011年,1977年处于“五五”时期,该突变点前后总体呈现“先降后升”趋势;1994年处于“八五”时期,该突变点前后总体呈现“先升后降”趋势;2011年处于“十二五”时期,年均增速7.8%是改革开放以来年均增速最低的五年期,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历经三次年均增速下降幅度相对较大的五年期。可见,将1977年、1994年和2011年分别置于前后一定的时间段来综合考虑,可看作经济增长中结构突变点(或拐点),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时间上的异质性,增长动力在结构突变点前后不同发展阶段具有阶段性特征。

(2)从阶段性增长动力演变过程来看:1952—1977年,计划经济时期资本、劳动力是主要的经济增长动力,政府干预和金融结构不合理性是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负动力;1978—1994年,改革开放后资本、劳动力、对外开放和城镇化水平提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动力,金融结构不合理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凸显;1995—2015年,资本、劳动力、对外开放、城镇化仍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动力,对外依存度、产业结构扭曲、政府干预、非国有化程度(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结构性矛盾和制度不匹配性等问题进一步凸显。

(3)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本、劳动力、对外开放和城镇化水平提升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四个主动动力,而产业结构扭曲、金融结构不合理阻碍经济增长的两个最主要的负动力因素。资本、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呈现逐步减弱趋势,科技创新和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显著增强,经济增长动力正从“要素禀赋型增长动力”向“科技进步型增长动力”、“结构优化型增长动力”和“制度创新型增长动力”转换。

以上结论对宏观经济管理与调控具有一定的启示,依靠传统的资本、劳动等要素动力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适应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政府应加快推进创新驱动战略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经济结构,注重要素配置效率,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市场经济由起基础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变,释放更多的经济增长活力。

参考文献:

- [1]Solow R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70(1).
- [2]吴敬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抉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 [3]Romer P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5).
- [4]Lucas R E.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1).
- [5]尹宗成,江激宇等.技术进步水平与经济增长[J].科学学研究,2009(10).
- [6]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M].苏剑

- 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7]刘小玄.中国转轨经济中的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J].经济研究,2003(1).
- [8]樊纲,王小鲁等.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J].经济研究,2003,(3).
- [9]张军.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J].经济学(季刊),2007,(1).
- [10]任保平.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动力转换[J].经济学家,2015,(5).
- [11]Aoki M. The Five Phas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C].Presidential Lecture at the XVIth World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2011.
- [12]蔡昉.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基于一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J].经济研究,2013,(11).
- [13]靳涛,陶新宇.中国持续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解析与比较[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11).
- [14]欧阳晓,易先忠等.技术差距、资源配置与后发大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J].中国工业经济,2012,(6).
- [15]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风险与效率提升路径[J].经济研究,2013,(10).
- [16]梁琪,滕建洲.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结构变化及因果关系研究[J].经济研究,2006,(1).
- [17]沈坤荣,余红艳.税制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动力重构[J].经济学家,2014,(10).

(责任编辑/刘柳青)

Judgment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Momentum Conversion Stages and Momentum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Qian Juan^{1,2}, Li Jinye¹

- (1.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2. Institute of Economy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Urumqi 83000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Bai-Perron multi-structure mutation model to find out the structural change point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s chow mutation test model and the real validity test to judge the stage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momentums. The paper also adopts the Lucas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to explore whether exist a conversion i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momentum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growth momentum conversion. 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have been three mutation points in endogenous structure sin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which manifest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momentum has time heterogeneity, and time-phased conversion features; economic growth momentum is being switched from the "factor endowment driving force" 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power"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power".

Key words: growth momentum conversion; stage judgment; momentum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multiple structural mutation